

# 百年巨变与振兴之梦

## — 20世纪江西经济研究

温 锐 廖信春 郭银仔  
游海华 许海泉 张英明等著  
江西人民出版社

○ 荣光与衰落  
○ 半世纪的起步与徘徊  
○ 五十年的开拓与攀升  
○ 困顿·挑战·机遇

# 伫立在新世纪的门口

(代前言)

星移斗转,日月如梭,瞬间又是一个百年。有哲人如是说:历史是现实的坐标,而现实是历史的印证,又是未来的起点。当我们就要迈步向前,跨入新的百年之际,回首过去,展望未来,明确目标,便显得异常紧要。

江西——泱泱华夏的瑰宝之地,山川秀美,历史悠久,南门北水,气候宜人。滔滔赣水滋养的儿女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,尽情挥洒,创造了风骚数百年的辉煌。几千年来,这里教育发达,人文鼎盛,是我国著名的“文章节义之邦”,诸多俊豪英才,名宦学人,如群星灿烂,光被四野。得区位之利,地处“吴头楚尾,粤户闽庭”的江西,其人民用勤劳的双手也曾绘就了“甲于江南”的古代经济繁荣的胜景。尤其在宋明两朝,这里更是壤肥物丰,家富户羨,“赋粟为天下最”,人民安居乐业。大自然给予了江西良多的嘉惠,历史的天平也总是给江西以更多的垂青,而使江西以卓异的风姿屹立于华夏大地。

“江西是个好地方,好呀么好地方……”这首饱含深情,在赣江两岸广为传唱的歌谣,曾经唱出江西人多少自豪,几多骄傲!

然而,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。当历史行进到 19 世纪下半叶,古老的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开始溶入海洋时代,华夏各地悄然地发生着巨变;而江西这艘拥有过诸多荣誉光环的古船,却依然在旧有的狭小航道上前行,对外部世界的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感应甚少。这就决定了其在与外部世界的竞争中必然要陷入相对落后的境地。

辉煌已然隐去，颓势终成现实。江西人带着无限的惆怅和强烈的刺痛进入了 20 世纪，从此，也在心底萌生起一个执着的振兴之梦。

进入 20 世纪之后，在“改造江西”的焦灼中，江西人背负起上个世纪的沉重包袱急起直追，从极低的起跑线上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征程，致力于江西的振兴与发展。历经百年的探索与开拓，江西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进步，可谓“旧貌换新颜”，但是相对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，与周边省份相比，则更是跌落到“经济盆地”的谷底。尴尬的现实再一次深深地刺痛了江西人的心。面对世纪末新一轮经济大潮的冲击，江西人再也无法平静。90 年代中期，关于“赣文化”的讨论在江西文化界陡然兴起。人们或慰藉于往昔的成就，或反思过去的辉煌，或诉说落伍的原因，或纵论振兴的方略，可谓众说纷纭，热闹非凡。其拳拳之心，切切之情，无不粲然溢于言表。但是，静心观之，在这一世纪末的骚动中，虽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和高深的理论分析，却又总似雾里看花，令人茫然，诸多疑问依然未得其解：

——江西传统社会的荣耀与近现代的衰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

——江西的区位与人文环境究竟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存在哪些错位，以致江西社会与华夏巨变失之交臂？

——百年来江西社会经济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历史轨迹？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又是什么？

——前后两个世纪末，江西在周边省区乃至全国究竟居于什么样的位置？其优势与劣势到底又在哪里？

——在中国振兴图中，江西的坐标点应在何处定位？切实的“圆梦”之策到底又在何方？

……

这一个个疑问，犹如一声声呐喊，强烈地叩击着江西人的心弦；这一道道难题，必须一一排解，否则，我们将无法面对未来。

岁月不居，逝者如斯。新的百年已经来临，人类历史就要翻开崭新的一页。新的世纪蕴藏着新的机遇，新的世纪也伴随着新的挑战。

伫立在新世纪的门口,江西人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麻木。因为,几多机遇,必须牢牢把握;几多挑战,有待沉着应对。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,江西人头脑应高度清醒。因为,纷繁复杂的难题,尚需设法破解,而振兴之梦又是那样刻骨铭心。

新世纪,新机遇,新挑战。那么,江西应如何抉择?怎样应对?本书在着力于梳理江西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史实的基础上,将就此贡献一孔之见。

作者

1999年12月

# 目 录

代前言 伫立在新世纪的门口 .....	( 1 )
<b>第一章 荣光与衰落 .....</b>	<b>( 1 )</b>
一、风骚数百年 .....	( 1 )
二、与华夏巨变之交臂 .....	( 14 )
三、19、20 世纪之交的赣鄱大地 .....	( 24 )
四、世纪初的声音：“改造江西” .....	( 30 )
<b>第二章 半世纪的起步与徘徊 .....</b>	<b>( 37 )</b>
一、传统农业的缓慢发展 .....	( 37 )
二、近代工业与近代城市的兴起 .....	( 52 )
三、农村商品经济与集市贸易 .....	( 67 )
四、农村手工业的兴衰嬗变 .....	( 84 )
五、交通变迁：动脉移位与振兴筑路 .....	( 97 )
六、小农经济与资本经济碰撞中的外贸 .....	( 112 )
七、近代新式教育的起步 .....	( 130 )
八、战争与乱世的困顿 .....	( 141 )
<b>第三章 五十年的开拓与攀升 .....</b>	<b>( 154 )</b>
一、农村经济的四台阶与新起点 .....	( 154 )
二、现代工业：市场份额与龙头品牌 .....	( 180 )
三、个体私营经济的曲折历程与新气象 .....	( 201 )
四、走出遗忘的角落：交通建设的壮举 .....	( 218 )
五、在计划与市场中辗转求索的外贸 .....	( 236 )

六、艰难前行的现代教育 .....	(251)
七、“人杰地灵”与旅游产业的新起 .....	(276)
<b>第四章 困顿·机遇·挑战 .....</b>	<b>(288)</b>
一、试与周边比高低 .....	(288)
二、世纪末的骚动与赣人的误区 .....	(299)
三、优势与劣势 .....	(306)
四、新世纪·新机遇·新挑战 .....	(314)
<b>后 记 .....</b>	<b>(325)</b>

# 第一章 荣光与衰落

## 一、风骚数百年

向古文献追溯江西史迹，是一件令人沮丧和尴尬的事。在中原文化人士的笔下，江西的文化地位很低，不过是一片荒蛮腹地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江西人即使到京城做了大官，也照旧被讥笑为“溪狗”。江西历史的荣光似乎姗姗来迟，直到唐宋时期才人文大开，夺得了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的桂冠。江西数百年的“荣光”和几千年的“荒蛮”一样，都令人倍感诡秘、费解和困惑。

感谢当代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，让江西古代历史的真相逐步重见天日。然而，即使引用那些大发现去追述“荒蛮”江西高潮迭起的历史荣光，也可能使人骇异，不敢相信那是真实的。

### (一)三苗文化和“青铜王国”

江西是“新石器时代革命”的策源地之一。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洞遗址，保存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堆积，它们距今已有9千到1万4千年。考古学家从中找到植硅石和孢粉，通过对它们的分析，表明距今1万年前，江西先民已能种植水稻。在考古学界没有新的重大发现以前，可以说江西是中国稻作农业最早的源头之一。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最古老的夹粗砂红陶罐，已被世人尊为中国陶瓷之祖，它也是从万年仙人洞文化遗址出土的，最早的年代可能距今已1.2

万年左右<sup>①</sup>。在中华大地上,江西先民的制陶技术处于领先地位。学术界把远古农业起源(含饲养业和陶器起源)称为“新石器时代革命”,这是人类历史上爆发的第一次产业革命,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进步。在考古学界没有新的重大发现以前,可以说江西率先爆发了“新石器时代革命”。到新石器时代晚期,即距今五、六千年前,江西境内水稻种植业、饲养业、以及制陶业、刳舟业和其他工业都已经相当兴盛,为文明社会在江西境内的孕育和问世奠定了历史基础。

江西是中华大地文明曙光最早升起的地区之一。当代考古学证实,长江三峡以东广袤的湖川山泽,存在一支风格殊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,它就是“三苗遗存”。依据史书和传说资料分析,三苗是江西的先住民,江西是三苗的活动中心。从“三苗”名称可以推测,他们的文化是稻文化。三苗曾经先后与黄帝、尧、舜、禹竞雄于世,威名远播。早在尧舜时代,三苗即已首创“五刑”和王权世袭制,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。三苗国都最初座落在江西柴桑、彭泽之间,后来西迁鄂境。大禹攻灭三苗以后,以王权世袭制(“家天下”)为特征的夏王朝才在中国降生<sup>②</sup>。文字是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。据考古报告,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的骨器或骨管中,有些留存一道道刻划痕,这是中国目前所见较早的记事或表数的刻划痕<sup>③</sup>。长江流域发现的以刻划为特征的古陶文,和它是一脉相承的,是不同于北方甲骨文的南方古文字。江西是南方出土陶文最多的地方,仅鹰潭角山窑址一处,就已出土陶文 1489 个。拿考古实物和古史传说相互参证,可以断定古史传说并非空穴来风,江西区域确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

① 彭适凡:《稳步前进,硕果累累——江西考古五十年》,《南方文物》,1999 年第 3 期。

② 张英明:《三苗文化:赣文化古老的源头》。见邹道文、傅修延主编《赣文化》论文集,江西高校出版社,1995 年版。

③ 彭适凡:《稳步前进,硕果累累——江西考古五十年》,《南方文物》,1999 年第 3 期。



江西是中国南方“青铜王国”。据考古报告,瑞昌商代铜矿遗址是国内已发现的最古老的铜矿遗存。吴城文化遗址在国内已发现的青铜冶铸遗址中,其规模最大。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,比殷墟商王妃——妇好墓还要多,在全国居首位。从青铜器造型、纹样和铸造工艺看,它们是江西本地铸造的。铜矿开采和冶铸,曾经是社会科技工艺先进水平、经济文化昌盛的综合反映。青铜礼器种类规格和数量的不同,是政治地位和权力高低的象征。大洋洲出土的铜钺之粗壮厚实,无与伦比,被称为“中华钺王”。因此,上述重大考古发现,可以证实江西曾经是中国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达之区,是南方青铜文明的中心。此外,大洋洲墓还可能是南方最高统治者,所以江西和南方文明史应当改写。也许有人会问,这个南方“青铜王国”何以不见诸古文献记载?保存至今的古史书,几乎都是依据“中华文明、中华历史一元论”的历史观来写的,它源于中原文化,将中华文明、中华历史的起源,说成是一个始祖——黄帝,一条母亲河——黄河,一块发源地——中原地区,至于其他地区原本全是蛮荒之地。当代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“正史观”不符合历史事实,中华文明、中华历史的起源和发展的真相是多元一体。南方辉煌的青铜文明和青铜王国,可能是被上述传统的“正史观”遮断的。至于南方青铜王国何以突然崩溃和消失?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历史之谜。

南方“青铜王国”的辉煌与遗憾并存,对江西历史的影响很深远。德国历史学家卡尔·雅斯贝尔斯在《人的历史》一书中指出: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,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,是世界性的“革新的时代”、“轴心的时代”,“人类的精神基础”在这个时代奠定,“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<sup>①</sup>”。春秋战国时期适逢这个“革新的时代”,中国当之无愧地向世界贡献出孔子和老子,还诞生了诸子百家,奠定了中华文化的“精神基础”,因此,春秋战国时代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“轴心的时代”。从这般广阔的历史背景俯瞰江西境内,一种区

<sup>①</sup> 引自《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2年版,第38—40页。

域性青铜文明的突然衰退，大伤了江西文化的元气。由于这种缘故，我们所能看到的江西是一片死水微澜，在诸子百家热烈争鸣的论坛上，也听不到江西人的声音。这段历史时期，中华各大区域文化个性日益分明，又日益综合，凝聚成中华文化的“合金”。从此以后，齐鲁文化、吴文化、越文化、楚文化……组合成了中华区域文化之林。可是，江西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，被吴文化、越文化、楚文化、中原文化分而化之，因而一度丧失其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地位。时至今日，“赣文化研究”热浪翻腾，可是要问历史上究竟有无“赣文化”，我们会倍感底气不足。

如果说三苗文化是赣文化古老的源头，那么，距今 3000 年前的南方“青铜王国”文化便是赣文化的直接源头。它在江西境内由盛转衰，固然是江西历史悲壮的一幕，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，它因之而获得一次“海纳百川”的机会，从中吸纳和积聚重新崛起的潜能。

## (二)“移民社会”和大十字交通干线

我们研究江西历史兴衰问题，不能不对它的活动空间或舞台有所了解。江西是一座特点明显的大盆地，东南西三面有崇山峻岭可作笔立的围墙，北面开门处有长江天堑可为天然的门栓，境内还有众多的河间小盆地和广阔的平原湖泊可供纵深回旋，总体看，它犹如“客家围屋”座落在中国东南腹地。“客家围屋”固然有封闭的天性，但是和长江上游盆地相比，江西盆地的开放性强过封闭性，或者说它更具有开放的天性，这是值得赣人文化性格研究者注意的。江西盆地周边地区虽然大山连绵，但是既无“蜀道之难”，又无“三峡之险”，出得去，进得来，散得开，其开放之天性堪称“全方位”。所以，古人说江西是宜战不宜守之地。历史上，即使出过想“守”亦即割据称雄者，也势难持久。所以，江西这种地理环境如果缺乏必要的经济、文化纽带，就有可能成为导致地域社会共同体分裂的地理因素。

江西盆地虽然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，但是自西周至宋元，它在行政区域上一直被分而治之。据考古报告，西周时期，江西出过

名为“艾”和“雁”的两个地方政权，它们都直接受命于周天子<sup>①</sup>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江西先后被吴国、越国、楚国豆剖瓜分，所以史称“吴头楚尾”，或“南楚之地”。秦汉以后，江西长期未能形成单独的、比较完整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元。至汉代，包括江西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，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还是“地广人希”，人皆“窳偷生，无积聚而多贫”。唐朝，江西境内设立江南西道，简称“江西道”，后来江西的省名亦导源于此。两宋时期，又改称“江南西路”。然而，整个唐宋时期，江西都被一剖两块，分别划给江南西道（或“路”）、江南东道（或“路”）管辖。赣东北那边的人，唐宋时期不自称“江西人”，而自称“江东人”。姚公骞先生谈论江西文化时，未称“赣文化”，而称“赣江文化”，他自有道理在<sup>②</sup>。直到明朝建立以后，江西盆地才终于定型为完整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元。长期以来，江西盆地的“左邻右舍”文化地位都比它高，它自己又缺乏很有吸引力的经济、文化纽带，加上出门交通便利，所以兄弟离散，各攀高枝去了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然抱怨江西人“太散”，这是有其历史由来的。

秦汉以后的千余年间，南方社会生活出现了大变动。由于中国统一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主流，以及国家税收和军政日渐倚重南方地区、甚至倚重南方中外贸易利源，全国经济文化交流方向得以转移，中外贸易的重心得以转向，形成纵贯南北的交通主干线。它穿过长江和大庾岭，一直延伸到南海之滨，正好在中国交通地图上划出一个大十字，从而使南北东西大动脉有可能纵横贯通。这场旷日持久的、潜移默化的大变动，深刻改变着全国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的大格局，带动了中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大转换，为中国在古代世界长期保持先进地位提供了新的能源。

大十字交通干线的出现，首先向江西输送的是一个“移民社会”。秦始皇南征两广，派出数十万兵力，兵分五路，其中有两路就扎在江

① 许智范：《江西文物概述》，《南方文物》，1999年第3期。

② 姚公骞：《江西史稿·序》。见许怀林《江西史稿》，江西高校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西境内,他们后来有不少定居下来了,这是见诸史籍的最早一批移民。从那时起到唐宋时期,中国人口迁徙的大方向是由北而南。在此期间,多次出现北人南迁的浪潮,他们大都沿着由北向南的交通主干线迁徙。江西得地理之利,处在大十字交通枢纽上,不仅军事地理位置重要,而且生存环境优越,加上长期地广人稀,因而吸纳了大批北方移民。对于还想继续南下的北人而言,江西又是必经的暂居地、中转站。北人南迁后,受南方文化的濡染,以及与南方民族通婚联姻,和合变易出汉民族的南方支系,即历史上说的“客家人”。客家人尽管转化为土著居民了,但还是出于文化价值取向的需要,在编修族谱时,仍将自己咬定在北方的祖根上,自称中原人。然而,他们已经变化了的血缘关系、文化关系以及体质特征,无不证明自己不再是“外来户”,而是“新南方人”了。江西既是新南方人的定居地,又是他们的暂居地和中转站,因而所谓新南方人便是“新江西人”。明清时期,闽粤客家人大批回迁江西,江西人把“客家人”作为他们的专名使用,实际上汉族江西人原本就是客家人。与此同时,许多江西人迁往中南和西南山地。江西人来自天下,又广布天下,因此近世以来不少人功成名就以后,都来江西寻根祭祖,江西成为汉民族南方支系的故乡。

曾有一种观点,说地理环境优越,温饱问题容易解决,会使人因易于为生而求安逸,不思进取。这个观点有所偏颇,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。对于移民而言,生存环境优越,是激发创业信心和拼搏精神的砺石。秦汉以后,中国社会大变动引发了大迁徙,生存环境优越的江西成为移民的最佳选择。历时近千年的阶段性移民潮,把江西改造成“客家社会”、“移民社会”。他们在生产经验、工艺技术、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、民俗风情、文化学术等方面,给江西带来新的信息、新的“血液”。通过移民这种文化载体,江西由中原文化边缘之地变成“广纳百川”之海,由此激励出源源不断的振兴江西的文化能量。同时,一浪接一浪的移民潮,还给江西带来了创业自强、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,这是古代江西人能够不断革除保守、封闭和求安逸之惰性的关键

所在。赣人文化研究者应当注意到江西的这一历史特点,否则赣人文化性格有可能被片面地改塑。千年的“移民社会”,不可能仅仅留下一堆文化“遗传病基因”。

在中国大十字交通干线上,大庾岭路的兴废对江西经济发展具有左右时局之重。从秦汉至唐朝前期,中央政府主要重视大庾岭路的军事和政治价值,一旦岭南大局已定,就会任其废弃。公元8世纪初,唐玄宗已经发现国都长安偏离大十字交通干线的弊端,有过迁都洛阳的举动。与此同时,西北边境动荡不安,中亚一带战乱不已,遮断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干线——“丝绸之路”,朝廷痛失一大利源。在此期间,“海外诸国,日以通商”,广州已经成为不仅影响岭南,而且影响全国的一大对外贸易口岸。张九龄是岭南人,洞察中外贸易重心转移的大趋势,并且力主为了“上足以备府库之用,下足以瞻江淮之求”,必须修复大庾岭路<sup>①</sup>。唐玄宗受南方海外贸易利益的吸引,同意并委派张九龄主办此项工程,时在公元716年。中国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海上交往活动,但是直到唐玄宗以前,这些活动几乎都是边缘性的。大庾岭路的修复,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线路和大十字交通干线的合流,意味着内陆中国开始有了和海外市场接触的新航线,其意义不止是让长安的杨贵妃能够吃上西南的新鲜荔枝。

在古代历史上,和人、畜力陆路交通相比,舟船航运成本低、运载量大、效益高,最能推动商业贸易的空前繁荣和持续高涨。陆上“丝绸之路”的衰落,其根本原因是竞争不过海上交通,启动不了世界的巨变。由于它的经济效益的累积不具有乘数效应,所带来的财富很快消失在大沙漠里。西方通向东方的新航路的开辟,使世界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增长具有了乘数效应,因而改变了西方的历史命运和世界的发展方向。江西之所以站到了大十字交通枢纽上,是得水运之利。鄱阳湖水运网络和长江、以及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可以畅通无

<sup>①</sup> 李世亮:《张九龄年谱》,第42页。见张九龄《开凿大庾岭序》,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4年版。

阻,大庾岭路修复之后,又恢复了和珠江水系以及大海的沟通,因而上升到大十字水运网络的枢纽地位。然而,江西自秦汉以来即已处在这个枢纽上,可是历史的辉煌仍然没有从地平线上升起。张九龄修复大庾岭路,适逢中外贸易重心从西北黄土坡向南转移,他便为内陆江西开辟了通往海外市场的新航路。于是,江西社会经济从此开始勃兴。

江西站在大十字水运枢纽上有何经济意义呢?它从此作为商业贸易的一大集散中心,加入到国内贸易和中外贸易分肥者的行列中,获取源源不断的、数额可观的商业利润,反过来又带动境内经济发展,激活了境内农工商并重和百业并举的传统,使地理环境优势迅速转化为社会经济优势,形成打入广阔市场的一系列拳头产品,由此推出不断放大的良性循环圈,把江西带进了中国南方文明昌盛之地。

商业经济增值效应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磁石和指南。鄱阳湖水系加入到大十字商业贸易网络以后,赣江、抚河、信江、饶河、修水沿岸,兴起了一系列墟场、集镇和若干商业城市,它们的大门都主动转向鄱阳湖敞开,成为连接全境经济文化的纽带。南昌地近赣江、抚河入鄱阳湖之处,得水运枢纽之利,迅速上升为整个大盆地的经济文化中心,到了明朝,它又上升为大盆地的行政首府。商业经济增值效应成为江西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的内聚力,使之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域社会共同体。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大变动,那么,所谓“赣文化”可能早在距今 3000 年左右,就变成历史化石了,南方“青铜王国”就会由于后继无人,变成又一种“玛雅文明”。

### (三)农工商贸和文化的兴隆

从历史时刻表看,以距今 3000 年前为上限,江西经历了千年沉寂、千年修炼,然后从唐代开始得“道”,开始勃兴,两宋时期,跃居全国经济发达地区。于是,江西历史舞台上好戏连台,高潮迭起,商业发达,农业兴旺,工业强盛,文化繁荣,人才辈出,蔚为大观,一直唱到清朝前期,依然兴犹未尽,可谓“风骚数百年”。

在这“风骚数百年”间,江西是中国商业经济发达地区之一。以

唐朝为界,在这以前,商船在长江来往,纷纷从九江擦肩而过,江西不过是南方商贸活动的“过路站”。从这以后,东南郡邑“舟船之盛,尽入江西<sup>①</sup>”,南昌崛起为江淮之间一大都会。浮梁地处荒僻,由于赣东北以及皖越一带茶叶流经此地,转入鄱阳湖,进入大十字交通线,崛起为一大商业城市。据许怀林先生统计,从唐德宗贞元九年(793年)起,浮梁每年上交国家茶税占全国茶税总收入的36.5%,在全国茶叶市场上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<sup>②</sup>。两宋时期,江西各地商业贸易空前繁荣,出现包买商经营方式。抚州布商陈泰向纺织生产者预贷本钱,到时收货,把抚州、吉安不少县邑的麻布生产纳入产、供、销一条龙的经营体系中,即促进了家庭纺织业的商品化,又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。六朝时期,南昌“衣冠之家”耻于经商,却又想谋利,便使唤“婢仆市道贩卖<sup>③</sup>”。两宋时期,江西风气转向农工仕宦相率不以经商为耻。心学大师陆九渊的大家族首要财源来自药店利润。文学家洪迈胆子更大,竟敢吁请在国史上为江西名商树碑立传。哲学家李觏说儒学的“不言利”已遭“世俗”厌恶,连他也要为正当的“利”、“欲”伸张正义,这是江西商贾意识在哲学上的反映<sup>④</sup>。

明清时期,江西经商潮涌,足迹遍于域内,并且在市场竞争中加强合作,形成著名的“江右商帮”,标志着江西地域社会共同体意识业已定型。就财力和能量看,江右帮仅次于徽帮、山西帮,位居全国十大商帮的第三位。景德镇是中国瓷都,也是世界瓷都。河口镇是中国茶都,它吞吐量的大小,直接影响到西欧茶叶批发市场(设在伦敦)的兴衰。樟树镇是中国药都,“药不过樟树不灵”。吴城镇为“三大都”之总汇,与之统称“四大名镇”。历史上曾有一说:“天下未乱蜀先乱,天下未治赣先治。”出门经商者必求社会稳定,受不了兵荒马乱的

① 《唐国史补》卷下,王说《唐语林》卷八。

② 许怀林:《江西史稿》,第132页。

③ 《宋书》卷八十四《邓琬传》。

④ 李觏:《原文》。引自《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·宋元明部分》,中华书局,1972年版,第8页。

打击。江西是中国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省份，故而人心思治。从江西奔流出去的“经商潮”，其影响之大，可用流传湖广的谣谚高度概括，即“无江西商人不入市”。婺源有许多人把茶叶生意做到南海之滨，詹天佑的先祖就是在广州发财的。那时，江西的瓷器、茶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拳头产品，打出去，全世界都望风披靡。然而，由于政府禁止中国人出国经商，工商大潮被关在广州城内，未能涌向广阔的世界市场，否则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。

在这“风骚数百年”间，江西是农业经济发达地区之一。自古以来，水稻生产就是江西的一大优势，它作为东南半壁河山的商品粮基地和国家公粮基地的优势地位，一直岿然不动。能否由此引出江西人有“重粮”传统观念呢？恐怕不好匆忙做结论。江西自古以来“食物常足，无饥馑之患<sup>①</sup>”，客观上没有必要过分依赖单一的粮食生产。所谓“重粮”思想，多半是朝廷经常对江西念“紧箍咒”所致，因为江西稻谷产量对国家有左右时局之重。然而，江西老俵的历史主动性仍然顽强不屈。唐宋以来，受商业经济增值效应的刺激，江西内部区域经济分工处在变化之中，农业的产业结构处在调整之中，稻谷和经济作物以及家庭工业产品处在商品化之中，所有这些深刻变化都是乡村社会自动的经济变化。大十字交通网络展示的市场前景，无疑是一种强烈的诱导和鼓舞。水稻生产优势固然是江西农业经济发达的反映，但它并非唯一的优势。江西内部，区域性农业经济分工很明显，山区的茶叶、竹木，平原盆地的稻谷、棉花，赣南、赣东北的烟叶、甘蔗、苧麻，南丰的蜜桔，乐平的兰靛，等等，区域性分工的格局很清晰，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商品化。江西农民家庭经济不完全是耕织结合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。陆九渊说他家乡金溪的许多陶工都是农民，他们农忙时种田，农闲时制陶<sup>②</sup>。由此可见，宋代金溪许多农民不是耕织结合，而是耕陶结合，制陶显然不是为了自给自足，而是

① 《汉书》卷二十八下《地理志》。

② 《象山全集》卷九《与张元鼎》。



为了满足市场需求。江西农民素有亦农亦商、亦农亦工的传统，都昌的农民同时又是景德镇的烧瓷工人，铅山的农民同时又是造纸厂的工人，广丰的农民同时又是煤矿的工人。凡有名优特产的地方，那里的不少农民又几乎都是大小商贩。江西农民经济结构和西北黄土坡的不是一回事。西北地力贫瘠、生存资源匮乏，故而偏重单一的小麦生产，“好农而重民<sup>①</sup>”，亦即“重本抑末”，“贵农(民)贱商(人)”。江西有条件农工商并重、诸业并举，其自然经济结构内部具有强劲的自我裂变的动力源，这是江西农业经济赖以发达、赖以商品化的内在原因。农工商并重，诸业并举，既是江西农业经济发达的特征，又代表了它的发展方向。

在这“风骚数百年”间，江西是中国工业发达地区之一。古人对全国百工技艺人才区域分布作过估算，说明代“今天下货财聚于京师，而半产于东南，故百工技艺之人，亦多出东南，江右为伙，浙直次之，闽粤又次之<sup>②</sup>。”在这份排行榜上，东南百工技艺人才之众，列为全国之榜首，而江西又居东南之上。我们耳熟能详的原是江西进士多、当大官的多，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江西工业人才更多。现在看来，我们对江西历史人才评判的价值标准、价值取向要作修正。

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以前，江西工业不仅在中国，而且在世界上也居于先进地位。唐宋以后，江西矿冶业发达，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、铅诸矿，历代都有开采冶炼。累积起来看，各种大小矿场几乎遍布江西各地，其中铜、铁二矿在全国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永平铜矿作为国家铸币中心之一，其优势地位历久不衰。明朝洪武年间，政府在全国开办 13 家炼铁厂，年铁产量 740 多万斤。江西占了 3 家，分别设在进贤、新喻、分宜。这三家炼铁厂年铁产量 320 多万斤，几乎占了全国官办炼铁厂年铁产量的一半，可见江西曾经是中国冶铁中心。

①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卷一百二十九，《货殖列传》第六十九。

② 许怀林：《江西史稿》，第 540 页。